

試論秦始皇

——秦始皇功大于过，“暴君”的称号应该翻案

罗焕泰

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提出：“我們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須得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翻案”①。

秦始皇在历史上是最受委曲的封建人物之一，几千年来，他被称为“暴君”，在这个称号之下，抹煞了他对历史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公正的，因此，替秦始皇“翻案”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我看秦始皇长时期在人們腦海中留下了極坏的印象与“孟姜女哭長城”及秦始皇“焚書坑儒”这两个故事，确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除此以外，人們对于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了解得并不很多。我以前就是受了这两个故事反宣傳的影响，而对秦始皇产生了惡感。郭老說得对：“历史是發展的，我們評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發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們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②。公正地說来，秦始皇他确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秦始皇对于当时的历史是有貢獻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整个民族的發展，文化的發展是有貢獻的，不仅有而且大，这是我們必須肯定的。但是从另一角度即从秦始皇所施行的各項政策給予人們帶來的災害來說，它过分地役使人民，他是一个“暴君”。但是我們评价历史人物，必須要“具体分析，全面照顧，重点掌握”③，不应当就这样否定他在如上所說的对历史發展的积极作用，对民族和文化發展的貢獻，只有这样，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所采取的正确态度。

郭老提出要“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翻案”，給予历史人物一个公平而合理的批判的看法的。我們应该响应这一倡議，把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拿出来討論討論，“人民是正直的，只要我們把真正的历史真实性闡明了，人民决不会把有功

于民族發展和文化發展的历史人物，長期地錯当成反面教員”④。秦始皇就是被当作暴君的典型化身的代表，冤枉地做了二千多年的反面教員。長期地把一位对历史有貢獻，对整个民族發展，文化發展有貢獻的人（当然也有他坏的一面），当作为反面教員总是不太妥当的。我們搞历史的人有责任把历史的真实性弄清楚，因此，我們乐于承担这个任务：替秦始皇翻案。

秦的統一，是符合历史客观發展規律的要求的。

秦统一帝国的出現，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經对周秦之际的历史作了这样簡要而深刻的分析：“如果說，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設官职以掌兵、刑、錢、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紳士作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础”⑤。很明显的，秦始皇的統一中国是从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到專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一个重要轉变。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統一大帝国，应该从秦帝国算起。

春秋战国間，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从而使得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应用，荒地的逐渐开垦，种植面积的逐渐扩大，耕作方法有了巨大的改进；又由于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施肥技术的进步，农業生产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农業生产提高的同时，手工业也有了發展。随着生产力的發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換發展了，城市也發展起来，而鑄造的貨幣也比較广泛的流通了。

到了战国后期，社会經濟更有了进一步的發展。發達的农業和城市經濟，使各个地区的經濟

①見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②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見“新建設”1959年4月号。

③翦文甫：“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河南人民出版社

社版1957年2月第一版第36頁。

④同①

⑤“毛澤东选集”第二卷，1953年第二版，第618頁

文化关系日益密切。据“荀子”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狗、马等家畜）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翻（鸟羽）、齿革（象牙、皮革）、曾青（碳酸铜）、丹于（氧化汞）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紵（紫色丝织品和麻织品）、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牛尾毛）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民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⑤。”从这里，可见当时广大地区内商品交易已相当发达，所交易的商品都是各地的特产，各个地区间经济上的联系、依赖已大为加强。

战国末年，在全中国范围内，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日益发展，各个地区在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上日益频繁，造成了在经济上的一种相互依赖和联系的关系；这种各地区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又构成了政治上统一要求的物质基础。“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都是战国以来政治上要求统一的表现，以求消除诸侯割据称雄的混乱局面，把全中国统一起来。秦始皇的统一，实现了这种要求，所以它是符合历史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的，从而是进步的。

秦的统一，是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从分裂的混战局面下解放出来。

战国时代是封建战争最激烈的时代，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战争越来越频繁，战争的规模越大了，而战争也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大的战役往往要相持三年之久。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要求统一。同时，由于诸侯的割据称雄，往往把边疆上大河的堤防扩建为长城，设立关卡，征收苛税，勒索贿赂，阻碍了各地必需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遇到天旱往往争夺水利，甚至有意阻塞别国水利，例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⑥”；遇到大水往往放水到邻国，即所谓“以邻国为壑⑦”；打仗时，各国又往往利用修建的堤防以“决水灌敌”或“壅水害邻”，黄河就会被一再决堤，人民所受的灾难是非常严重的。

当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的北边已有强大

的游牧部族匈奴、东胡等出现。战国时代，匈奴族正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向奴隶制过渡的阶段，掠夺性特别强烈，恩格斯说：“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⑧。”这些游牧部族对于边疆的侵扰，对于农业的损害是很严重的。秦、赵、燕三国与匈奴为邻，为防备匈奴的侵害，都在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上筑起长城，并派重兵把守。在秦灭六国期间，由于激烈的封建战争，赵、燕等国往往利用坚强的边防军投入到封建战争中去，给了匈奴侵入中国以可乘之机，从而占据了河套一带，这对于中国北部边境的威胁是很大的。在北方强大的游牧部族的威胁之下，国防的利益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加速形成，人民群众也迫切希望停止封建的战争，集中力量来制止游牧部族的侵扰。

战国时代的封建割据和封建战争，以及激烈的封建战争不断的造成大水灾和边防的失守，给匈奴族侵入中国以可乘之机，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很沉重的，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很大的，因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从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下摆脱出来，迫切要求经济上、政治上较好的国家迅速统一全中国，希望能够有“明天子”出来完成“统一”。只有“天下定于一”，才能免除战争的灾难，才能给人民以太平，给经济、政治、文化以更好更有利的发展条件，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国防，集中力量来制止北方强大的游牧部族的侵扰，以确保自己的独立。关于封建时代统一国家作用的原理，斯大林在莫斯科建成八百年纪念日的祝词中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假使不能从封建割据中和诸侯的纷争中解放出来，那末它便不能指望保全自己的独立，不能指望真正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才可能期待文化经济的重大发展，才可能确保自己的独立⑨。”而秦的统一，则解除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因列国割据战争而遭受的种种痛苦，消灭了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邻国农业生产的行为，废除了列国间重重的关卡，可以集中全中国的力量以防御北方匈奴的入侵，并且能融合全中国人民的智慧来发展共同的文化。这就使中国从封建割据中和诸侯的纷争中解放出来，有可能得到经济与文化的重大发展，及确保自己的独立。所以秦的统

⑤ “荀子”、“王制篇”。

⑥ “战国策”、“东周策”。

⑦ “孟子”、“告子篇”。

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社1954年第158页。

⑨ 转引自葛利科夫：“斯大林与历史科学”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37页。

一是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和利益的，因而也就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所谓“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①”正因为秦始皇的意愿和行动符合于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够在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当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时，人民是把他看作使人们“更生”的“明天子”的。而秦始皇本人也常以完成统一使人民得到安居乐业而自夸。在琅邪、鄒峯山和碣石的刻辞中，一再提到这位皇帝的功和德是：禽灭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戍兵；“一定天下，兵不复起；災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男乐其疇，女修其事各有序……莫不安所^②。”

秦统一帝国的出现，不仅符合于当时历史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符合于当时人民的利益的，而且对中国以后历史发展，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国家。秦帝国的建立，则初步奠定了我国现有领土的基本部分。秦帝国的版图，大约“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姜中（今甘肃省西部），南至北哨户（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北据河（黄河）为塞（长城）并（傍）陰山至辽东”，都是秦帝国的领土。可见秦始皇时，领土相当广阔。

管理这样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庞大帝国是不容易的。战国时代，各国由于经过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剥夺了领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以领取俸禄的国家官吏代替世袭封地的领主贵族的世袭官职，逐渐建立了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秦统一以后，继承这些制度又加以发展，建立了一套管理大帝国的政治制度。秦朝实行郡县制度，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全国各地，集中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避免了各地方的割据称雄或互相斗争，巩固了帝国的统一，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是适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的政治制度。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所建立的一套官制，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影响是巨大的，秦以后，统一国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都是因袭秦的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为了巩固统一和维持皇帝的政权，秦始皇实行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统一全国的货币，统一全国的文字，使全国人民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使用

同一文字，同一大小的度量衡、同一货币，除了度量衡、货币及文字的划一外，秦始皇还规定了统一的車軌（車广六尺）又把原来秦国的法律施行于全国，消灭了战国时代各地制度的种种差异现象，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③”，实在是当时社会上重大的改革。这不仅对消除封建割据的影响、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加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也具有积极作用。为了统一，对各种反抗力量实行强力压制，如：拆除内地长城与军事要塞、决通川防、修治驰道、销毁兵器、迁徙豪富、焚書坑儒……都是。

焚書坑儒“的确是残酷得令人咋舌”吗？

焚書坑儒这件事是使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来蒙受不好的评价的最大原因。历代儒家最恨秦始皇这一件事，这我们倒不去管它；然而在今天，在我们史学界的一部分人中，对秦始皇焚書坑儒这件事看法上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史苏苑同志说：秦始皇焚書坑儒这件事“的确是残酷得令人咋舌了”，“关于焚書坑儒一事，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因此，对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这一举动“必须表示深刻的憎恨并加以严厉的谴责^④。”显然，秦始皇焚書坑儒这件事，史苏苑同志是认为不应该的，这是一种莫须有的暴行。到底秦始皇焚書坑儒这件事应不应该呢？这就值得我们争论了。问题提出来争论，就是要求得到解决，而要争论问题，解决问题，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儒家的圈套，秦始皇“暴君”这一罪名，也将永远不得解脱。郭老提出：“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这一点对我们评价历史事件却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评论一个历史事件，必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从阶级观点出发，看其对历史发展是否起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追求出历史的真实性。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来评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问题就好解决了。

焚書，这种手段无疑是不好。在这种措施之下，古代的许多典籍及秦国以外的历史记载遭受到了焚毁，这的确给中国古代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对于秦始皇的焚書，我们不能单从焚的观点上来看，而且也不要过于夸大。

① “史記”、“主父偃列傳”所引严安語。

②③ “史記”、“秦始皇本紀”。

④ 史苏苑：“中国历史人物简論”，1957年6月第一

版第9頁。

⑤ 以上引語均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或“李斯傳”。

秦朝統一全中國，完全推翻了封建領主的統治，廢除了分封王侯的制度，建立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統治。秦統一後，抱着維護過時的封國制思想和思想慕古的還是很多的。這些人對於統一是持反對的態度，對於秦始皇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一的各項政策和措施是加以誹謗和攻擊的。他們頌古，並以古非今。他們說：“殷周之王，千餘歲”是因為“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如今秦一統天下，而不分封，使其子弟為匹夫，“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頌古非今，主張分封。事不師古就不能長久，這顯然是一種開倒車的反動思想；以古來非今，這顯然是對秦統一政治的一種誹謗和攻擊。代表新興地主利益的法家，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得力助手——丞相李斯，聽其議則以歷史是發展變化的進步觀點“認其說，細其辭”，對儒家的復古思想大加駁斥。他說：“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異變也。”因此，李斯認為這班人都是“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的。主張嚴加禁止，並因此建議焚書。否則，“儒生們就會根據他們的私學，對定于一尊的法制加以誹謗，這樣就會使主上的威勢降低，臣下的黨羽形成”。為了統一思想，為了鞏固專制主義的集權統治，在當時的情況下，秦始皇採取了李斯的建議——焚書。焚書是手段，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動思想言論才是目的，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卻是有進步意義的，這是必須肯定的，而且是主要的。同時，秦始皇也並沒有把所有的詩書百家語全都燒掉，中央博士官府仍藏有這些書，而當時民間也有暗中保藏古書的，否則，在今天秦以外的古書我們將一無所見。

在秦朝，新舊（新興的地主階級和代表六國異族利益的反動階級）兩派的鬥爭是貫其始終的。焚書坑儒一事，僅僅是新舊兩派鬥爭中的一個方面。就秦始皇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講，秦始皇、李斯和儒家思想的鬥爭，是統一與封國的鬥爭，是進步與反動的鬥爭，是順應歷史發展與違反歷史發展的鬥爭。當時儒生所抱的政治思想是恢復周朝的封國制度，這是一種開倒車的反動思想；秦始皇所走的路是統一和集權，這是一種順應歷史發展的，也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這一鬥爭中“是”是在秦始皇這邊的。因此，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兩種思想鬥

爭的結果，是當時進步思想和反動思想鬥爭的結果，是進步派和反動派鬥爭的結果。”焚書坑儒所體現的是在政治上代表進步的人對代表反動的人的一種打擊和鎮壓^⑧。這對於鞏固秦帝國的統一是大有幫助的。要說他有“過”，只是因為使用的手段較粗暴一點罷了。

秦始皇修長城，過分地役使了民力，使得很多人妻離子散，直到現在民間還流傳着“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這自然是不好的。祖國歷史上的偉大工程，它都包含着勞動人民的辛酸與血淚；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修長城，擊匈奴，在當時都是有積極意義的，是符合於當時人民利益與要求的。

前已言之，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戰爭期間，匈奴游牧部族乘中國激烈的封建戰爭的時機而佔據了河套一帶，這對於中國北部的邊境卻是一個莫大的威脅，人們早就希望結束封建的戰爭，求得中國的統一，以便集中全中國的力量來對抗北部強大的游牧部族，確保國家的獨立，秦始皇順應了歷史的發展，依靠了人民的力量而統一了全中國。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以後，便集中全國的人力、財力，對匈奴有了更大的防禦和還擊的力量。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遣蒙恬帶了三十萬大軍大舉進攻匈奴，取下了河套內外地方，把匈奴追逐出了戰國時代趙長城外，解除了匈奴對於中國北邊的威脅。這對於當時北方邊防的鞏固，對於邊境人民的生命財產的保護，對於邊境農業生產的保護，都是起着重大的作用。

特別值得我們提出的，就是秦始皇在收復河套以後，採取了三項重大措施：一是建築“馳道”，加強了對邊境軍隊的支援；二是設置郡縣，移民開墾荒地，以改變邊境地區人口稀少和經濟落后的情況；三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國防，因而把日秦、趙、燕三國北邊的長城連接起來，加以修理，並在險要的地方建置要塞，築成有名的“萬里長城”。這條長城西起隴西郡的臨洮（今甘肅岷縣境），東至遼東郡內，長五千餘里，是古代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也是古代中國廣大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偉大成果，曾經在中國歷史上長期的扞衛祖國的重任，對於保護中國北部邊疆的安全及保護中國的農業生產是起了積極的作用的。我們現代稱贊萬里長城的雄偉壯觀，不能忘記古代勞動人民的艱苦與偉大！

秦始皇還曾先後策劃開鑿了兩條河，即邦國渠

^⑧何茲全：“怎樣評價秦始皇”，“新華報”1959年4月號。

^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觀本”人民出版社1949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18頁。

和灵渠，这对于加强全国的经济联系，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秦始皇除了在北方和匈奴人作战以外，还向南方开拓疆土。在征服越族以后，建立起了桂林、象、南海三郡，并把内地人民大量移到西南地区，秦始皇就会以五十万人戍守五嶺，把进步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进步的文化带去，使越族人民和内地人民逐渐融合，使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进步，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重大贡献。

以上所有秦朝巩固统一的政策和确保中国独立的各项措施，里面虽然掩藏着许多罪恶，但它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所以基本上也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维护统一的局面，防止分裂割据的再现，抵抗外族的侵略，确保中国的独立，是促进经济与文化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后中国能够长期得到统一，此后中国的独立所以能够长期得到保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继续高涨，我们不能不归功于秦的统一。今天的汉民族是世界上有着同一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的最大民族，秦帝国的统一对于汉民族的形成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秦帝国的统一，它推动了中国以后历史的发展。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秦始皇对于当时的人民，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长期地把一个对历史有贡献，对整个民族发展、文化发展有很大贡献的人称为“暴君”，这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的，应该翻案。

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秦帝国，并在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统一，而雷厉风行的实行了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各项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当时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使中国在当时得免于外族的侵扰，保证了边疆的巩固，并对于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也有着极深刻的影响。自然，秦帝国这个功劳不能写在秦始皇一个人的功劳簿上，而首先应归功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付出了无数血汗和生命，历尽了无数的艰辛和痛苦，才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作为一个完成统一和“一代天驷”的代表人物——秦始皇来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由于他的“雄才”和“大略”则加速了这一历史转变过程，这一作用

是必须予以估计的。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如果杰出人物底观念和愿望正确表现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正确表现着先进阶级的要求，那他们就能成为杰出的人物也”。秦始皇就是由于他的愿望和行动符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符合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并依靠和利用了人民的力量而获得了这样史无前例的卓越成就，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所以给予秦始皇以“英雄”的称号是受之无愧的，它确“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确不愧为一个“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的杰出皇帝。

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统一国家，为了奠定他万世一系的帝位的基础，为了加强对人民的专制统治，事实上，秦始皇在建立这个统一大帝国的过程中，是很猛烈经营的。在他由统一到死的十一年中（前220——210年），他曾五次出巡全国各地，在治理国事上，他是十分认真的，“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可是有人却借此来攻击秦始皇，说秦始皇极端讲究个人专制独裁（事实上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看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在秦朝仍保留了大臣们的议事制度，秦王政号称皇帝，秦朝不分封而设郡县，以及焚书坑儒等事，都是交群臣议决后而采取的。我们怎么能说，秦始皇极端讲究个人专制独裁呢？试问，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几个皇帝能象他那样听群臣议事呢？我看没有几个能象他那样。所以秦臣在泰山石刻辞中颂扬他：

“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良利，尊隆教誨”。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帝在处理政务上有象秦始皇那样努力的，他这种工作的精神还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有极高的地位，这是不成问题的，从问题的主要方面来说，“暴君”的称号应该翻案。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他不顾人民的死活和战后的休养生息，过分地役使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评。评价历史人物只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结合，只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则，才能正确的处理历史人物；才能正确的评价秦始皇。